

红山文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第一章

北方远古文化的秘密在这里揭开

——关于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

一、红山文化的首次发现

红山，雄踞于内蒙古赤峰市城区东北隅，英金河畔，距城区6公里，由凤凰峰等5个主山峰构成。其最高峰海拔746米，面积约10平方公里，南北走向，巍峨屹立于赤峰盆地之中，孤峰突起，赤壁奇崛。每当朝霞夕晖，反射壁间，宛如冲天烈焰。据地质工作者考察，红山之所以山石赭红，是因“燕山运动”形成的花岗岩体，其主要成份是钾长石、石英、黑云母等矿物质构成，花岗岩中钾长石的含量一般为40%至45%左右，而赤峰红山的花岗岩体中钾长石的含量超过50%。正因造物者给红山得天独厚的“恩赐”，所以才使此山红峰似火，灿若丹霞，与新疆吐鲁番中部，古称火州的我国第一座火焰山相媲美。经地质工作者鉴定，我国西北部的火焰山是以砂岩反射阳光著称于世。再经《西游记》神话小说的渲染，不胫而走，成为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美谈；而我国东北部的第二座火焰山——赤峰红山，则以它年轻

特有的红色花岗岩体，经阳光反射，显得格外嫣红秀润挺拔而闻名中外。

红山，称乌兰哈达，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山峰，清代设治于此的乌兰哈达巡检、乌兰哈达理事通判厅以及今之赤峰市、红山区皆以此山而得名。

大自然的威力把红山装点得色彩斑斓，山上的奇峰异石，有的像将军，持剑而立，有的如大佛摩崖而居，有的似雄狮，临高远眺……这些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更给红山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红山脚下的英金河水，自西南而来，迎面撞到山脚下，回环北上，沿山麓又折而向东，蜿蜒汇入老哈河（古称土河、吐护真河）。

古老的红山，以其山峦的特异，吸引着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赋诗泼墨，抒发胸襟。

清代诗人李调元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阴历四月四日途经赤峰时，在他所著的《出口程记》中对红山的描述是：“紫峭削壁，如霓如云，返照壁间，棱角愈见”。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六月，赤峰修建的最宏伟的古建筑兴教寺（关帝庙）碑亭有一幢记胜碑，称乌兰哈达为“山水环绕，南有宝山之巍峨。北有河水之润泽，其东北诸峰赤色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

晚清赤峰举人，诗家赵玉丰，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游红山时，挥毫写下了“不见奚王帐，红山万劫秋，河声吞赤壁，月色挂丹邱。毡雪汉臣泪，燕支胡女愁，谁能倚长剑，遗迹吊松州”的抒怀诗。时值丙辰（1856年），赵氏再次来红山，感慨万千，又吟咏出“万朵芙蓉面面栽，蟠螭塞北直飞来。山多赤坎难移去，井有丹砂掘未开。几部霰奚降叛地，千秋苏李死生哀。至今饶乐河边水，呜咽双桥去不回”的七言诗句。

1929年（民国十八年）赤峰县知事孙廷弼主持编纂的《赤峰县志略》对红山的记述是：“其山势突兀，岩石秀润，尤为赤属群山之冠。山下有龙王庙一座。每当夏令，士人恒携拊酒往游焉。”

建国后，1961年8月28日，中央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在团长叶圣陶先生率领下，游红山公园，于茅亭内小憩。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代画师林枫眠先生，逸兴湍飞，笔酣墨饱，一挥而就，雄奇俊逸的红山跃然纸上；当代文坛巨匠舒舍予（老舍）欣然写下了“塞上红山映碧池，茅亭望断柳丝丝。临风莫问秋消息，雁不思归花落迟”的佳句，意犹未尽，并作注：“1961年秋初，来游红山新湖鱼池，峰红水碧，远望绿柳千行，风光不让江南，雁乐于此不思归矣”。

红山不仅以自然景观的特异性吸引了众多的文人游客，更重要的是红山本身和它周围广大地区蕴藏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中外专家，他们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不远千里来到热辽大地的边塞之城赤峰，对红山及其周围进行考古调查。

最初进入热河、赤峰进行考古调查的有日本人和法兰西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三十四年（1908年），日人鸟居龙藏博士，三年中入热河省三次，前后共居留27个月，足迹踏遍全省，并对赤峰英金河畔的几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进行考察。1914年（民国三年），鸟居氏发表了《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破天荒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出热辽大地上的远古文明信息。1924年（民国十三年），法兰西传教士桑志华、德日进二氏合作（他们的大本营是法国天主教堂在中国天津马场道设立的北疆博物院。中国北部各地的天主教堂是他们的工作站），来到赤峰，对红山前进行实地考察，采集到一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鸟居、桑志华氏，虽然找到了许多古遗址，但他们的工作几乎完全限于地面的采集；就是偶作试掘，对于地层的包涵也没有

确切地观察。

我国老一辈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对热辽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1930年（民国十九年），他怀着的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探索中华民族起源的强烈愿望，克服战乱、交通不便等种种困难，毅然赴黑龙江转道通辽入热河境内。经开鲁、天山、林西、经棚至赤峰。梁思永先生在赤峰英金河北岸和英金河南岸，包括红山嘴（红山前）在内的沙窝中进行考察。河两岸的面积很大，在南北宽约2.3里，东西长4.5里的范围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较晚时期的文化遗存，并采集到细泥红陶片、夹砂灰陶片、细石器、打制石器、骨器及青铜器等遗物。因病及对城子崖的发掘直至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8月完成《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的调查报告。在材料不充足的情况下，预言到西拉沐伦河（西辽河上游）南北之间文化的差别，应作为专门研究课题，并已注意到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作为南北文化接触地区的重要性。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日本驻赤峰领事馆代领事牟田哲二曾把他在红山及其附近采集（包括征集）到的一批陶器、石器、青铜器等重要文物赠给来赤峰访问的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助教上治寅次郎。上治将这批文物运到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教室，供师生及其考古界人士鉴赏，从而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注意。1933年，牟田又与鸟取森男、金子健儿等人对红山及其附近，进行调查。嗣后，并将一批珍贵的出土文物赠给到赤峰红山进行发掘考察的东亚考古学会。同年秋，以德永重康为首的满蒙学术调查团第一次来到赤峰。研究人类学的八幡一郎等调查了红山一带，在红山前（山南）以及裸露着花岗岩的西崖下采集到许多古文化遗物；在红山后（山北）清理发掘石棺墓数座，并带走了全部出土文物（含征集品）。1935年以京都帝国大学总长滨田耕作博士为首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成员，对赤峰红山前、红山后古遗址，首次

进行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事后，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根据发掘辑录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及出土遗物，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于1938年出版了考古专著——《赤峰红山后》一书，详细记述和分析了中国长城以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重大发现。《赤峰红山后》的问世，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在中国长城以北的热辽大地，早在五、六千年以前，这里就有一支从事农耕为主兼营畜牧、渔猎的远古先民，他们世代不息，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远古文化。这一发现，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发人深思，引起了中外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二、建国后的考古新发现

红山文化是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文化类型，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前主要是地面调查采集，仅有沙锅屯、昂昂溪、红山后等处经过清理发掘。新中国建立之后，文物考古事业有了迅速发展，在以辽河流域为中心（主要是西辽河上游老哈河、西喇沐伦河、大凌河）的广大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工作，并选择不同的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通过发掘，对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文化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发现了若干新的考古文化，对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内涵、相对年代以及文化特征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成果斐然。

1954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尹达先生对赤峰红山后首次发现，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形陶共存，磨制石器与打制细石器共存的原始文化，正式命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

同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者汪宇平先生到赤峰，对红山及其附近进行调查，他在红山西南坡脚下的龙王庙平地上，发现了红陶片，在山脚东西长约60米，高约1.5米的文化层中发现了红陶片和石斧，在红山西南东园子村的东北面，有一台地，发现许多灰色绳纹陶片（汉代遗物）以及红褐色陶片、罐、盆之类，其中有少量彩陶片和石斧。

在李家屯有一山峰，山的东南坡上发现有细石器遗址，遗物有榆树叶形、梭形、三棱形石镞等。

1956年7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裴文中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吕遵谔先生，率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门化三年级部分学生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组汪宇平等一行到达赤峰。对红山前三个地点、红石后石棺墓地和红山后北大沟住地，进行考古教学实习，复查发掘。经考察，发现除过去已比较明确的细泥红陶、彩陶与石器、细石器共存的所谓“赤峰第一期文化”之外，过去所谓“赤峰第二期文化”实际上还包含几个性质面貌不同阶段，而在其早晚诸阶段既可以与中原一带对照，又可以看出它们自身的特征和传统关系。并指出关于赤峰第二期文化年代问题，滨田氏等认为属秦汉时期（尤可能是盛秦）。经这次复查，据其文化内涵观察，如高脚分裆鬲、磨光夹砂红陶、磨光打制石器、青铜镞和石棺墓等。其年代不会晚到秦汉。所谓“赤峰第二期文化”应比秦汉时期更早。

1960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刘观民，徐光冀等同志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队密切配合下，对夏家店、药王庙遗址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两种不同文化性质的堆积，并以初次发现这两种文化相对关系的地点和层位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于早商——西周）；对原“赤峰第二期文化”所包含的主要内涵称为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周一春秋——战国前期）。

1960年，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1987年改为赤峰市博物馆）

苏赫先生与敖汉旗文化馆的文物工作者一起首次在石羊石虎山发掘红山文化时期墓葬一座。

石羊石虎山位于孟克河西岸，在新惠镇北1公里处，山的西南有一山洪冲刷的土沟，沟崖暴露着灰坑和骨骼，再往西约200米土沟的南岸发现墓葬一座。墓内有仰身骨架（已残破仅存头骨及四肢）。

随葬器物有陶器、石器、蚌器等30余件，大部分完整。陶器中有罐、壶、孟、钵等。陶质为细泥红陶和夹砂黑陶，手制，素面居多，仅有黑红色彩陶一件。其中双耳双口连通壶为首次发现，而彩陶孟上的红陶衣及黑纹彩，其制法似与红山文化的红衣彩陶有些接近，但彩绘的纹饰为回形纹，又与红山彩陶不同，其陶孟的器形，则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孟接近。石器有斧、刀、镞、珠、纺轮等。

196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为了对“细石器文化”作进一步研究，从统称的“细石器文化”中区分不同的考古文化，调查了富河沟门、金龟山和杨家营子三处遗址。

富河沟门村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70公里，乌尔吉沐沦河东岸，富河来自东北穿过村中，于村西南汇入乌尔吉沐沦河。遗址在村北两个相邻的山岗上，分布于山岗的南坡，距离现代河面25—60米，遗址的范围，南北宽200米，东西长300米，地表隐约可见许多小片灰土圈，共150余个，都分布在山腰，东西排列有序。在这里发掘其中的12个“灰土圈”，发现房址37座，发掘面积600余平方米，并发现有独具特征的一组器物群。

金龟山位于林东镇北30公里，乌尔吉沐沦河西岸的两座相连的山岗，山岗高出现代河面约40米，南面的一个山岗，南临乌尔吉沐沦河的旧河道，遗址主要分布在坡度平缓的南坡，东西宽130米，南北长120米，地表隐约可见“灰土圈”，从山脚至山腰计有“灰土圈”41个，东西排列有序。同年试掘其中的一个“灰土

圈”，发现了相互叠压的4座房址。出土的器物群与富河沟门文化性质相同，但也有些特点，可能与富河沟门的遗址在时间上有早晚的不同。

南杨家营子位于林东镇北35公里，乌尔吉沐沦河东岸，遗址在村北的山岗上，当地人称半拉山。遗址的中心区在坡度平缓的东南坡。地表采集的遗物有的与红山文化相同，有的与富河沟门遗址相同。这里发现的4座红山文化的房址，被富河文化层叠压，从而明确了两种文化在这里的相对年代。

通过以上三个遗址的调查发掘，结果表明，富河沟门这类遗存，无论在陶器、石器和骨器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在与这个地区分布的红山文化有明显的不同，因此以首先发掘的地点暂名为富河文化。其分布范围，在乌尔吉沐沦河流域较为密集，西喇沐沦河沿岸也有发现。但在西喇沐沦河以南、哲里木盟地区，尚未发现这类遗存。富河文化以相当成熟的细石器、打制石器和“之”字形纹直筒罐、圈足钵为主要特征，其中以富河沟门遗址的材料最为集中，特点也更为突出，表现出更多的畜牧经济型特点，经C¹⁴测定年代为距今5000年左右，在石器、陶器方面与红山文化更为接近，当是两种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在西喇沐沦河两岸地带交错分布、共存影响的关系。富河文化与沈阳市发现的新乐下层遗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如陶器皆为夹砂陶、器形以大口筒形罐为主；新乐下层陶器上大量的“之”字形线纹，在富河文化上也有发现，金龟山遗址则更为明显，说明他们有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C¹⁴测定的两个数据来看，新乐下层遗存的年代，较富河文化的某一阶段要早得多。这是否也为金龟山遗址包含有富河文化的早期阶段提出了线索，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富河文化与新乐下层遗存有共同的分布地域和反映两者关系的堆积层。

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刘观民、刘晋祥、赵信、郑文兰、杨国忠等同志对赤峰西水泉遗址进行发掘。

西水泉遗址在赤峰近郊北9公里处，位于英金河的支流，阴河与召苏河之间的土岗上，遗址主要是红山文化堆积，也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打破红山文化的地层。文化层厚不及1米，在文化层中，发现半地穴式房址和数量较多的陶、石、骨器及蚌器，特别在陶器群中破天荒地发现泥质褐陶妇女小塑像。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它早于辽宁1979年在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被誉为“中国维纳斯”的陶质妇女小塑像，这是一处较典型的中期红山文化遗存。

蜘蛛山遗址位于赤峰市区兴隆街北端，英金河南岸，北大桥西南侧的山岗上，高出河面10米，这个小山岗，主要是由古代文化层堆积而成，发现有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秦汉四种不同文化堆积。经过考古发掘，明确了这四种文化的相对年代，同时也增加了对赤峰地区战国—秦汉文化遗存的了解。红山文化堆积层厚为0.35—1.5米左右，它分布于遗址的西部。所发现的陶片，陶质分为泥质红陶、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三种，其中泥质红陶最多，占全部陶片的二分之一以上。

1971年春，在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北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特大型玉龙。1975年夏，辽宁省博物馆曾派考古工作者到现场调查。

这件玉龙通体呈墨绿色，高26厘米，完整无缺，体卷曲，呈“C”字型。吻部前伸，头上无角，鼻端前突，有两个并排鼻孔，嘴紧闭，头顶额底刻有网状方格纹，双目长鬣，眼尾成锐角，不刻瞳孔，颈脊起长鬣，长21厘米，龙体横截面呈椭圆形，直径2.3—2.9厘米。龙尾内卷，龙背有对穿的单孔，孔外径0.95厘米，内径0.3厘米，经试验，以绳系孔悬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这件玉龙，系用整块玉料圆雕，细部运用浮雕、浅雕手法表现，通体琢磨，光洁圆润。龙体伸曲刚劲有力，长鬣高扬，造型

古拙，世所罕见。

赛沁塔拉村，位于赤峰市北100余公里，翁牛特旗所在地乌丹镇西北约10公里处，村北群山环绕，山南为一片平缓的丘陵地，山下有季节性的河沟，玉龙就出土在山南的半山坡上，在玉龙出土范围内采集到属于红山文化的泥质红陶片和压印“之”字形篦纹陶片等遗物。从出土地点到山顶一带，还分布有较多红山文化遗物。这里是一处面积较大的红山文化遗址，采集到红山文化习见的夹砂灰褐陶片，泥质红陶片，彩陶片和石耜、石磨盘、石磨棒等。

嗣后，在翁牛特旗黄谷屯征集到一枚黄色玉龙。其造型同赛沁塔拉玉龙相似，但卷曲方向相反，呈钩状。龙体用黄玉雕刻，所用玉料经过特殊选择，利用天然赭黄色石作龙头龙尾，吻部和尾部则呈赭黄色。这枚玉龙的另一特征是吻部呈弧形并向上翘起。工艺较原始、古拙。

1973年，辽宁省阜新市文化局、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对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进行清理发掘。

墓地位于大凌河支流忙牛河东岸的一个漫圆土丘上，西边与北票六合城村隔河相望，墓地所在的土丘系含沙质黑土堆积，表层含较多的石片和泥质红陶片，在近表层处的大石围圈附近和墓地南侧一段长约5米的范围内，布满泥质红陶碎片并夹碎石片，石围圈和石围圈下压彩陶筒形器群，两座玉器墓均压在黑土表层下面。

墓中置长方形石棺，东西向，薄石板铺底并作顶盖，以较厚石板砌壁。石棺内有一具尸体，仰身直肢，头西脚东，其随葬品全部为玉器，共15件。有勾云形玉佩、玉龟、玉鸮、玉鸟、玉璧、玉环、玉珠、玉棒等。

位于石围圈南外侧发现一多室石棺墓（以石板分隔成5个单室），除一室为双人葬外其余均为单人葬，随葬玉器4件，有三联

璧和鱼形坠。

1974年6月—8月，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现赤峰市博物馆）、敖汉旗文化馆（现敖汉旗博物馆）共同对小河沿的三道湾子、四棱山和南台地等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

三道湾子遗址位于三道湾子村南老哈河东岸，地表分布有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战国时期遗物，发掘了红山文化窖穴。

四棱山遗址位于白斯朗营子村南，遗址东西长200米，南北宽50米，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发现红山文化窑址6座，形制有长方形单室窑、马蹄形单室窑和双火堂窑三种。窑内出土许多陶器，已复原30余件，其器形和红山文化有许多共同点，但也出现了新的器型。石器有耜、斧、刀、磨盘、磨棒和细石器。

南台遗址，位于白斯朗营子西南第一级台地上，高出老哈河河床20—25米，遗址东西长242米，南北宽85米，总面积约二万平方米。含有新石器时代遗物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并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房址打破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地层。清理房址7座，其中有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房址4座，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址3座。在发掘房址过程中，发现一小屋，陶片成堆，其中有大型双耳罐、彩陶尊、八角形彩陶器座、带孔圆形石器等新器形。这种文化在发展阶段上可能稍晚于红山文化而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于中原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阶段，学术界有人称为小河沿文化，或红山文化小河沿类型。

1974年至1975年，辽宁省文物队郭大顺等同志与翁牛特旗文化馆的文物工作者先后几次调查了昭乌达盟翁牛特旗海金山牧场所属的海金山遗址和河南岸的白音汉东八家遗址。

根据调查所采集到的陶器和石器分析，海金山是比较典型的红山文化类形的遗址，烟叶形石耜、梯形弧刃斧，双孔石刀及彩陶片等器形与赤峰红山后遗址所出的遗物相近。东八家遗址是以

细石器和“之”字形纹陶共存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细石器种类多而齐全，不仅在西拉沐沦流域属首次发现，也可与东北松花江流域永吉星星哨遗址，山东临沂凤凰岭发现的细石器相媲美。它与沈阳新乐文化（第一期）相近而早于当地红山文化遗存。

1977年夏，在昭乌达盟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二道丈房大南沟村的石棚山上，发现一处保存较好的原始社会氏族墓群。

墓地位于海拔近千米的石棚山顶部，东、南两面的向阳坡上，面积约8,800余平方米。墓地正当赤峰与翁牛特旗的交界地带，东南距赤峰市约30公里。

同年9月，由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翁牛特旗文化馆联合组成发掘队进行发掘。历时45天，揭露面积5,000余平方米，发掘清理古墓77座。整个墓地墓葬分布较密，并遵循一定规律作东西或南北纵横排列。墓坑分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土洞墓两种形制。这次发掘的77座墓，其中有单人土坑墓、男女合葬墓、无头骨墓、无骨架墓等，全为屈肢葬；合葬墓都是二人脚相对、头向相反，下肢屈而相互交错，这种特殊的埋葬形式，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实属罕见。

77座墓中，共出土陶器200余件，主要有罐、豆、壶、钵、碗、盆、高足杯、器座、勺形器、尊等十多种器形。这批随葬品最显著特点是豆盘有敛口钵式、折腹盆式、杯式等。壶类形多样，以双颈连通壶最为独特，是原始工艺珍品，彩陶器有各种不同形制的壶类和豆、钵等。

纹饰多饰在器物的口沿，肩部和腹部。花纹绘制方法多样，主要有附加、刻划、压印、锥刺、笔绘、涂朱等。纹样有附加堆纹、细绳纹、三角纹、回字纹、方格纹、网纹、篦纹、指甲纹、锥刺纹、动物图象、原始文字符号等十多种，豆类器座多以三角镂空作装饰。

彩陶花纹更富于变化，以三角形与平行直线相结合、半圆形

与平行直线相结合、三角形和半圆形间隔与平行直线相结合、以及菱形与直线相结合，构成各种几何图案。也有的同原始文字符号与花纹图案或动物图象相结合构成彩陶图案。其特点是行笔流畅，线条疏朗，别具风格，与红山文化彩陶花纹有所不同。

石棚山墓葬群的发掘，是七十年代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重要收获之一。仅从出土的陶器来看，就很有特色。鸟形壶、双颈连通壶、彩陶尊及其器座，都是新石器时代的艺术珍品。特别是直腹罐上的原始图画文字符号的出现，是原始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字产生的萌芽。

石棚山原始氏族墓群的发掘，获得了一批墓葬材料及具有特色的陶器珍品，这一文化具有独特的原始文化面貌，它与辽西、赤峰广泛分布的红山文化有所区别，使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领域内增添了新的文化类型，它的发现已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

1979年7月，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凌源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城子山遗址，同年10月进行试掘。

城子山遗址位于凌源县凌北乡三官甸子沟下村的山坡上，南距凌源8公里，地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地带，东北行8公里即是建平县牛河梁红山文化墓地。

城子山遗址，除局部含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外，主要是红山文化堆积。试掘揭露出红山文化的墓葬三座、房址一座，并发现文化内含有区别的二、三两层相叠压的地层关系。

发现红山文化遗物有玉器、石器和陶器。三座墓葬共出土石器17件，其中11件为玉器，诸如勾云纹玉饰、玉钺、竹节状玉饰、玉鸟、玉环、猪头玉饰，此外有石斧、石锥等。陶器（陶片）中器形较新颖，有的属首次发现。二层出土的陶片有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褐陶和夹砂红陶，三层只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器类主要有无底筒形器、敛口钵、斜领罐、平底盘、彩陶器座、直腹瓮、